

# 讲述百年仰韶故事

本报记者 付裕



1921年仰韶村首次发掘时合影(左起为袁复礼、安特生、村长王先生、布道人)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发来贺信,勉励中国考古工作者百年来的辛勤工作。人民政协报记者躬逢盛会,并走访了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您讲述仰韶文化遗址考古的百年故事。

##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夹杂着灰岩和遗物的地层,以及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

当年10月,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再次来到仰韶村。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甚至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发掘完成回到北京之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些文物系统、全面地研究,经过按遗存深度进行逐层分析,他们一致认同安特生的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名称的原则,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重要地位逐渐清晰。

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

作为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涉及黄河中游甘肃、青海、河南、山西、陕西等10个省区,仰韶文化研究基本明确了文化特征、时空框架和源流演变,深入探讨了仰韶时代人类社会形态、资源环境、生产模式及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初步勾勒出中华文明孕育萌生时期的生动历史画卷。

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告中国有了自己的石器时代文化,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开创了近代田野考古的先河,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理论,具有非凡的意义。

## 仰韶村遗址的四次发掘

百年以来,仰韶村遗址先后进行四次考古发掘。仰

韶村遗址的百年考古历程反映着中国考古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

1921年,经当时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中国学者一起进行首次发掘。该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为仰韶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率领,在仰韶村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有排列稠密的墓葬,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灰绳纹陶、带流陶杯等,出土文物十分丰富。通过第二次发掘,考古学家基本明确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和面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进行的新考古发掘项目之一。

1980年10月至1981年4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渑池文化馆,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这次发掘是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的,发掘面积共200余平方米。发现原始社会房基4处、窖穴41个,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613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发掘和对所获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考古学家认为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

2020年8月,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同时,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同步进行。这次考古发掘受到广泛关注,并入选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此次考古发掘围绕遗址南部核心区和遗址中北部仰韶文化壕沟、龙山文化环境等重要遗迹开展考古发掘研究相关工作,为黄河文化、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课题提供新的考古资料。

经过努力,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有了新的发现。最主要的发现在仰韶晚期,地层堆积厚,出土遗物发现数量最多,以陶器为主,另有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从考古调查、勘探及第四次发掘情况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遗物种类多样、内涵丰富。此次考古发现的青灰色“混凝土”,可能为房屋建筑地坪,“涂朱”红褐色草茎泥可能为房屋建筑墙壁,这些高等级房屋建筑遗存在仰韶村遗址是首次发

现,为研究仰韶遗址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技术等提供了新材料。

仰韶村遗址还出土玉钺、玉环、象牙镯形器等高等级遗物,并出现大型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其聚落面貌比仰韶中期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是仰韶村遗址的鼎盛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

此外,经过科研人员对仰韶村遗址尖底瓶的检测与分析,认为尖底瓶残留物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通过对仰韶村遗址墓葬的14个土壤样品的分析,还发现了仰韶村遗址墓葬中可能曾存在过丝绸实物。

## 见证百年中国考古学

系统性考古勘探和第四次考古发掘表明:仰韶遗址现存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渑池盆地中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较长、学术价值较高,是渑池盆地一处重要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

也可以说,仰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见证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荣滋长,半坡、姜寨、庙底沟、西王村、大地湾、杨官寨、西坡、黄山、西山、大河村、双槐树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发掘,不仅丰富了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更是在田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

仰韶村遗址在1961年即被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建设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0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2021年,在仰韶村遗址基础上,包含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馆、文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项目在内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

据了解,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89.89公顷,重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项目和文物展示项目占地900余亩,设计总投资1.6亿元。遗址公园将景观串点连线,集遗址保护、考古价值阐释、考古发掘展示和科

学研究、休闲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考古景观,成为展示仰韶文化的重要窗口。其中,仰韶文化考古发掘点也成为该公园的网红“打卡地”,考古发掘点突出展示了仰韶村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的真实性以及遗址环境的完整性。

同时,仰韶文化博物馆也位于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中,其也是国内首家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该建筑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由关肇邨主持,整个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第二区

计独特新颖,布局科学合理,文化特色厚重,建筑外围整体颜色以陶土本色为主,从感官上仿佛是一座“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博物馆”,给人带回到远古时期。近来,针对原馆面积不大、陈展落后等问题,进行了重新升级布展。

2020年11月,对仰韶文化博物馆进行重新布展提升,总投资3000万元,设计

布展总面积2386平方米。博物馆内展区基本陈列部分共包含四个部分,分别为基本陈列、近20年豫晋陕仰韶文化核心区考古成果展、数字化展厅和专题展。该馆展出文物近4000件,大部分为距今数千年的仰韶时期出土文物,其中包括1166件的石盘状器、三角纹彩陶盆等,为国内较大规模的史前博物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馆东侧,矗立着一座全长106米、高4.5米的百年考古历程红砂岩大型雕塑墙。从雕塑墙南段起始,中国考古百年画卷徐徐展开。从渑池仰韶村遗址、北京周口店遗址群、安阳殷墟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双槐树遗址,这些内容对于我国百年考古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呈现出百年考古的重要脉络。同时,一大批杰出的考古学者雕像矗立其中,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等,扎根田野、著文立说,让中国考古薪火相传、英才辈出。

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出土彩陶全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三门峡庙底沟》等书籍同时出版发行。

其中,《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由陈星灿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共有十卷,收录新石器时代彩陶2460多件。全集是对中国百年考古出土彩陶的一次科学

# 百年古厝“大夫第” 爱国儒商“晓春伯”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翔安区马巷镇,坐落着一栋清代光绪年间土木、砖石结构的“二落带护厝”形式的闽南红砖民居,又名“大夫第”,是20世纪厦门鸿儒巨商洪晓春故居,老人们更愿意亲切地称呼他为“晓春伯”。在厦门市中山公园,有一座桥特意命名为“晓春桥”,就是为了纪念爱国商人洪晓春。

洪晓春是何许人也?为何受到如此礼遇?他与厦门又有什么渊源?

## 做商人 经营有方急公好义

清朝光绪年间,洪晓春从马巷镇来到厦门岛内经商,创办源裕商行,开始只经营粮食,以后逐渐发展,兼营信局、出入口商、汇兑钱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厦门商务总会成立,洪晓春先后任商务总会会长、主席,他在商会在任的20多年间,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商会群体的力量,与政府官员、日籍商人的斗争中,维护商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妥善处理苛捐杂税和金融风波。他大力提倡国货,倡议举办国货展览和组建国货公司,参与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由于洪晓春的公正诚实,所以得到南洋各地侨商的信赖,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不断提高,赢得闽南人士的钦仰。

不仅如此,洪晓春热心公益事业,针对当时厦门道路狭窄的状况,洪晓春主张开辟马路,面对日本浪人与地方上恶势力的刁难,他不屈不挠,厦门第一条马路——开元路,耗时7年终于开辟,与洪晓春的努力密不可分。为适应城市发展,1929年,他与张镇世等投资组建厦门市汽车公司,1934年厦门开始了民营的市内公共汽车行驶。

洪晓春还动员华侨回乡参加建设,邀请同安数位华侨合资组织兴安公司,建筑兴安街数十幢房屋。接着,又兴建了第七市场、第五市场等。印尼华侨黄超群、菲律宾华侨李昭北、越南华侨陈式灿、马来亚华侨陈可补等在他的动员下,纷纷回厦,于思明南路、大同路、鹭江道和中山公园周边一带建设楼房,现鹭江道片区已成为厦门市热门旅游景区。

## 做文人 吟诗作文兴学助教

在文化教育方面,洪晓春也有诸多建树。

洪晓春虽出身科举,但他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赞同中西文化合理的融会贯通。他将马巷的“枋山书院”改为“枋山学堂”,成为马巷地区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枋山学堂嗣后又改为高初两等小学(即马巷中心小学的前身)。

1906年,洪晓春与黄廷元、杨景文等人发起成立“大同两等小学堂”,为大同小学的兴建校舍、增添教学设

备和常年经费到处募捐,并为大同小学的发展远景运筹策划。100多年过去,这所清末小学堂现已是厦门市的知名小学,蜚声八闽。

1920年他又发起倡建马巷启智学校,还独资或合资兴建留东学校和刘五店光华学校、毓秀女校,接纳贫苦子弟入学。

由于洪晓春热心教育事业又有学识,还一度被推选出任厦门教育会会长、思明县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筹助厦门大学经费的“厦大协进会”发起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洪晓春从海外归来,虽已年届八十,仍然情地加入筑路诗社,举办“竹林雅集”赋诗唱和。还出席厦门市文獻委员会成立大会,讨论编修《厦门市志》。

## 做中国人 宁死不屈堂堂正正

抗日战争期间,洪晓春参加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被推选为劝募部部长,率先捐献给厦门市商界人士筹款支援抗日救国。

1936年12月,洪晓春72岁生日前夕,厦门市商会、厦门市教育会、益同人公会等40多个社团拟联合为他举办祝寿活动。洪晓春得知情况,立即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国难严重,前敌将士风餐露宿,自维衰老,不能执干戈以卫国家,已属遗憾,何敢重累各界耗资,以自逸乐。”他的谈话见报后,各界人士很受感动,改变原先盛宴祝寿的做法。遵照洪晓春的意愿,“将欢宜酿资充慰劳前敌的捐款”。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踏上厦门,百姓纷纷外逃,社会秩序大乱,百业凋零。日寇为稳固其统治,拟利用洪晓春在厦门的威信和社会地位,企图请他出任伪厦门市维持会会长。日本领事泽重信多次亲自出马,使尽利诱威胁手段,但均被严正拒绝。

洪晓春为避敌纠缠,免受利用,74岁高龄时离别病床上的老妻,搭乘开赴菲律宾的“丰庆轮”。经香港赴越南,继而转赴马来亚马六甲,流亡期间相继到妻子和儿子在厦门去世的噩耗,北望桑梓,老泪纵横,但只好强忍悲痛。后定居在新加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寇对洪晓春的迫害仍不放过,洪晓春借故住进医院并连夜乘火车转移,又被日寇追踪缉捕,关进马六甲观音亭集中营达数年之久。在狱中,日寇又胁迫其出任厦门市市长,洪晓春宁死不屈写悔过书,怒斥敌人“八十老翁,无过可悔!”

1946年10月,82岁的洪晓春从集中营获释回到厦门,厦门上千人自发冒雨到轮渡码头迎接。国民党政府授以他“忠贞爱国”匾额一方,并将厦门市洪本部街改名为“晓春街”,以表彰他的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洪晓春历任厦门市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和省工商联会筹委会主任。

# 月牙彩陶罐 仰韶村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器物

仰韶文化制陶业较发达,在当时人们居住的村落中,都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个时期的窑址上百座。

陶器发明和农业产生有关,随着农业种植的发展,定居之后的人们需要煮蒸粮食,陶器应运而生。仰韶文化的陶器质地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和黑陶较为少见。器形主要有杯、钵、碗、盆、罐、瓮等,其外形规整,线条流畅,具有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

仰韶文化早期陶器的制坯停留在手制阶段。中期以后,先民利用转轮拉坯,并出现磨光工艺。仰韶文化陶器装饰手法以彩绘为主,制陶工艺或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或用工具刻画。这些图案和纹饰,反映出当时的生产生活和艺术想象力。

作为仰韶文化的珍贵器物,月牙纹彩陶罐已经从简单描绘实际景物过渡到了抽象的几何纹饰。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先民的审美取向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整理/付裕)



仰韶彩陶器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